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Third Edition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 青少年心理学手册 [第三版]

## 第2卷 青少年发展的环境影响(下)

[美]理查德·勒纳(Richard M. Lerner)

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 主编

张文新 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青少年心理学手册 [第三版]

## 第2卷 青少年发展的环境影响（下）

[美]理查德·勒纳（Richard M. Lerner）

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 主编

张文新 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少年心理学手册 / (美) 勒纳, (美) 斯坦伯格主编; 张文新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303-19343-1

I. ①青… II. ①勒… ②斯… ③张… III. 青少年心理学—手册 IV. ①B844. 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2480 号

---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

QINGSHAONIAN XINLIXUE SHOUCE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48.5

字     数: 214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8.00 元(全六册)

---

策划编辑: 关雪菁    周雪梅    责任编辑: 齐    琳    常慧青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3rd Edition, Volume 2,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3rd Edition (9780470149225/0470149221)

by Richard M. Lerner and Laurence Steinberg

Copyright © 2009 by Wiley & S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中文字版专有翻译出版权由 John Wiley & Sons, Inc. 公司授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和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本书封底贴有 Wiley 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中文简体版由威利公司授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1-1171

第3部分

对健康发展的挑战

The Broader Context of Adolescence



## 社区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塔马·利文撒尔 (TAMA LEVENTHAL)

维罗尼克·杜佩热 (VÉRONIQUE DUPÉRÉ)

珍妮·布鲁克斯-刚恩 (JEANNE BROOKS-GUNN)

社会环境，特别是家庭之外的社会环境，对个体生命中第二个十年发展的影响程度与日俱增(Booth & Crouter, 2001; Bronfenbrenner, 1979; Steinberg & Morris, 2001)。青少年自主需要的日益增长意味着青少年会在家庭之外度过更多的时间，特别是与同伴在一起的时间。社区被认为是青少年在家庭之外度过时间的主要社会环境之一。社区不仅为青少年的频繁活动提供了物理场所，还为青少年之间一系列的互动提供了社交空间。

在美国，将社区作为青少年发展的社会背景进行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那时，社会的人口学特点发生了变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移民增加，这些都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城市青少年的关注。“进步时代”的各种变革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反映，如青少年法庭的形成(Kamerman & Kahn, 2001)。然而，直到约一个世纪后，社会学家才尝试去证明社区的位置与青少年发展之间的关系(Samp-

son & Morenoff, 1997; Sampson, Morenoff, & Gannon-Rowley, 2002)。该主题研究的重心持续集中在城市青少年和他们参与的危险行为上,如犯罪和不良行为(Park, 1916; Shaw & McKay, 1942)。像早期的研究一样,当前对社区作为影响青少年发展的环境背景的研究兴趣仍然受到了人口学环境变化的激发(Hernandez, 1993; Massey & Denton, 1993; Wilson, 1987, 1996)。工业化社会的工作岗位中服务类和技术类工作者更易失业,加上市中心贫困者和失业者更加集中,再次激发了社会对城市青少年及其问题行为在科学和政策上的关注(Bursik, 1988; Kornhauser, 1978; Sampson, 1992; Sampson & Groves, 1989; Sampson & Morenoff, 1997)。当代关于青少年在社区环境中的发展研究,多数来自发展科学家的研究。尽管他们的兴趣在于研究危险行为,但是也已经开始从更宽泛的视角对危险行为的结果和社区的类型进行研究(Leventhal & Brooks-Gunn, 2000)。

本章的目的是综述社区和青少年发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实证研究以及理论上的新进展。第一部分总结了揭示社区影响作用的研究方法,集中介绍了测量工具和研究设计。第二部分综述了当前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青少年发展的研究发现,这里的青少年发展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成就(教育和就业)、情绪和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犯罪、违纪行为及药物滥用)、性行为 and 生育。第三部分阐述了社区影响青少年发展结果的潜在路径,本书所主张的理论模型包括制度性资源(社区资源的特征和可及范围)、规范和集体效能(社区的社会结构、同伴、人身威胁)、人际关系和联结(父母教养、家庭环境、支持网络),大多数与青少年有关的发展过程都进行了重点强调。第四部分强调了社区影响青少年发展的研究中所出现的新趋势以及这个领域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后,总结了关于社区环境、青少年期和相关政策问题的未来研究方向。

## 研究社区环境中青少年发展的方法学问题

该部分简要回顾了研究社区环境中青少年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方法学问题，包括社区的定义、社区维度的确定和测量、研究设计、问题选择。对这些问题加以概述可以给本章其他部分的内容提供一个背景。

### 社区的定义

当在社区环境下研究青少年的发展时，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是社区？”常用来定义社区分析单元的策略有两种。最常用的方法是采用美国每十年一次的普查数据，这些数据在每个十年中第一年的四月通过普查表收集上来。一个社区(neighborhood)通常被定义为一个普查的居民点，每个居民点包含 3000~8000 人。居民点的确定需要参考当地社区的建议和普查局的指导意见，以及那些能够标识社区的主要物理和社会特征，如主要街道、铁路、种族分类等类似特征。另一个通用且更小的社区分析单位是街区(一个普查居民点包含 1~4 个街区)，包含 600~3000 人。有些研究者将 2~3 个邻近的或相对同类的居民点或街区放在一起成为社区群(Brody et al., 2001; Sampson, Raudenbush, & Earls, 1997)。最小的社区分析单元是街道或面对面的街区，它们只包含某个人所居住房屋的街道两边。与此相反，大多数研究在收集被试报告的社区情况时并没有具体指明社区的界限。即便如此，居民所报告的社区界限近似于普查的居民点的界限或居民点组成的群(Coulton, Korbin, Chan, & Su, 2001; Sampson, 1997)。

## 社区的维度

界定社区的维度时，在社区结构和社区变化过程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分点。社区结构必须包括构成性或社会人口学的属性，如平均收入、就业率、种族构成。社区变化过程包含的方面如社会组织和制度性资源。尽管社会组织被认为是社区结构的一种功能，但是社会组织反映了居民共同努力工作来完成共同目标、实现价值、建立制度的能力。建立相关制度可以规范大家的行为（特别是青少年），从而更好地促进这些目标的达成（Sampson et al., 2002; Shaw & McKay, 1942）。制度性资源包括呈现能促进居民健康、幸福及一般性社会福利的组织和服

考虑到普查数据的可获得性，大多数研究都使用基于普查的社区结构特征的测量（Jencks & Mayer, 1990; Leventhal & Brooks-Gunn, 2000）。社区收入或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和经济指标的组合物）是最常用于研究的结构维度。研究者经常将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结果分为高社会经济地位/富裕（如高收入居民的百分比、专业人员的百分比、受大学教育者的百分比）和低社会经济地位/贫困（如贫困者的百分比、女性当家家庭的百分比、接受政府援助者的百分比、失业率）两种。进行这种划分的原因是贫穷和富裕邻居的存在可能与青少年的发展结果存在不同的联系（Brooks-Gunn, Duncan, Klebanov, & Sealander, 1993; Jencks & Mayer, 1990）。常考虑的其他结构特征还有种族和民族差异（如非裔美国人的百分比、拉丁裔美国人的百分比、国外出生的人口百分比）以及居民的不稳定性（如过去五年迁出居民的百分比、在当前的家庭居住少于10年者的百分比、自己拥有住房者的百分比）（Brooks-Gunn, Duncan, & Aber, 1997; Sampson et al., 1997）。尽管不同的研究在社区结构维度上存在普遍的一致性，但它们对这些结构维度的具体界定仍然存在些许差异。

社区社会组织的特征调查通常包括非正式的社会控制(informal social control)和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描述了居民根据社会所接受的实践行为来监控他人行为的程度。社会凝聚力是指社区内社会联结的程度。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凝聚力的结合性测量可用来评估“集体效能”(Elliot et al, 1996; Sampson et al., 1997)。其他组织的特征可能来源于物理混乱论和社会混乱论中的相关内容,这些混乱包括社区中的不良物理情况(如废弃的房屋、墙壁上的涂鸦)和社会互动情况(如酗酒和卖淫)(Ross & Jang, 2000; Sampson & Raudenbush, 1999)。机构性资源包括服务、学校、健康护理设施、娱乐项目的数量和质量。社区普查并没有直接评估社区的组织或资源,而这些组织和资源对检验理论模型来说是必需的。因此,很多基于父母或青少年评定来获得社区变化过程的研究是存在问题的,主要问题如下:第一,它们经常混淆基于被试评定获得的不同测量结果,导致方法变异出现共同问题;第二,这种测量的信度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大多数的实例中测量依赖于个体性数据,而不是生态学数据以及处理数据的相应方法。劳登布什和桑普森(Raudenbush & Sampson, 1999)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通过多种报告者(更适宜独立地研究家庭)来收集数据的“生态测量”标准,并认为这样可以增强社区测量的可靠性,还可以采用合适的统计工具产生社区水平上的信度指标。

社区需要替代性的方法来测量所提到的社区过程,这些方法包括系统性社会观察、社区调查、社区专家调查、行政性数据。系统性社会观察或走街法是让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按照固定的结构形式通过视频录像、评估者核查表或录音来描绘社区的特征(Barnes McGuire, 1997; Kohen, Brooks-Gunn, Leventhal, & Hertzman, 2002; Raudenbush & Sampson, 1999; Sampson & Raudenbush, 2004; Spencer, McDermott, Burton, & Kochman, 1997; Taylor, Gottfredson, & Brower, 1984)。社区调查必须对社区的非参与研究者

进行访谈,得出独立于通过参与研究者获得的社区测量结果(Sampson, 1997; Sampson et al., 1997)。此外,在每个社区访谈多样的居民可以增加社区测量的信度。社区专家调查则要求访谈主要的社区领袖(如重要的宗教、政治、商业和社会领袖),来获得对所在社区的描述(Sampson & Raudenbush, 2004)。替代性的行政数据资源可从城市、州、联邦事务处获得,这些数据包括来自医疗部门的重要统计信息、警察局的犯罪报告、教育部门的学校记录、人口和社会服务部门的儿童虐待和忽视记录(Coulton & Korbin, 2007)。

## 研究设计

对社区影响青少年发展感兴趣的研究者曾经使用过非实验和实验两种方法进行相关研究,下面对两种方法分别进行综述。

### 非实验方法

最早的社区研究采用基于普查的社区结构特征测量,并结合对青少年和他们家庭的数据收集来考察社区住处和青少年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这种早期的非实验研究有两个研究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型的国家数据库,如收入动态专门小组研究(Hill, 1991)和儿童—青少年营养供给的国家追踪调查(Baker & Mott, 1989)。这些研究在社区(和家庭)的类型上通常存在很大变异,并且被允许评估的社区效应仅是基于每个社区的少数几个青年来完成的。第二个层次的研究样本是从单一城市或地区中抽取青少年而获得的样本,这类样本中所抽样的社区范围和社区类型同样在不同研究间存在差异。这些城市和地区样本构成常常主要来自城市中的低收入社区。该类研究中众所周知的样本包括匹斯堡青少年研究(Loeber & Wikstrom, 1993)、巴尔的摩开启学校研究(Entwise, Alexander, & Olson, 1994)、芝加哥青少年发展研究(Gorman-Smith, Tolan, Zelli, & Huesmann, 1996)。

许多较早的非实验研究采用增补性的普查数据进行横断研究，并主要用于描述社区住处和青少年发展成果之间的关系；然而，研究并没能获得青少年的发展过程和所居住社区之间的动态关系信息，并且这种关系可能会通过许多不同的内在或外在的方式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社区研究的下一阶段需要接受这一挑战（研究社区动态变化关系），包括那些研究设计中含有社区变量的研究。在这些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中，需要考察大范围的社区类型（如来自不同社会人口学构成中的社区），或者抽样具体的不同类型的社区（如贫困和中等贫困的社区）。抽样时还需要确保每个社区有足够数量的青少年，如每个社区起码有 15~30 个被试（Duncan & Raudenbush, 1999），以便进行多水平的纵向分析。多水平分析能够评估社区内和社区间发展结果中的变异，并获得社区影响青少年发展结果的更可靠评估。芝加哥社区人类发展项目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该研究的普查数据被用于界定两个分层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三个水平）和种族—民族构成（七个水平）。通过这两个变量对社区进行交叉分层，随后选出由 80 个社区群组构成的分层概率样本用于分析研究对象的纵向构成（Leventhal & Brooks-Gunn, 2003c）。将这 80 个社区中自出生到 18 岁的儿童青少年分成七个年龄组，每个社区群组中访谈大约 75 个儿童。此外，芝加哥社区人类发展项目还包含一个独立的社区调查部分，即针对社区内部活动的社会过程而访谈社区中的居民，同时还进行系统的社会观察。

## 实验方法

为了使住房规划背景中的低收入家庭进入特定类型的社区，进行了将家庭随机地划分到某一社区类型中的实验研究和准实验研究。因为住房规划项目难以满足所有符合条件或有权益的家庭，所以作为研究对象的社区通常是随机选择或基于住房（准随机的）进行选择，又或者两种情况兼有。在这些研究中，得到支持的部分家庭会从高贫困社区的公共住房中迁至低贫困社区中，例如，获得优惠券而从私人市场

租赁房屋的家庭或者在非贫困社区获得公共居住房屋的家庭社区。

最早的准实验研究是高特罗项目(Gautreaux program),该项目是在1976年颁布的废除芝加哥公共住房种族歧视的法令之后开始实施的。许多家庭会得到搬家的优惠券,并根据住房房源进行分配(Rubinowitz & Rosenbaum, 2000)。最著名的实验研究是公平房屋迁移机会的论证项目,该项目是由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于1994年发起的,发起的部分原因是回应高特罗项目所获得的积极发现。将优惠券随机分发给5个城市的大约4,600个家庭,让其从高贫困社区的公共住房中迁移到他们自己选择的私人住宅或低贫困社区(有专门援助)的公共住房中;基于这一研究设计,一部分家庭仍然待在原来的公共住房中(Goering & Feins, 2003)。

另一类相对新的实验研究是自然实验研究,这类研究中所发生的一些外源性或外部变化会随着时间影响居民或社区(Fauth & Brooks-Gunn, 2008)。尽管只有少数这类研究对社区本身进行集中研究,但是已有数个研究在郡县或邮政区域水平上考察了环境整顿对儿童健康的影响(Chay & Greenstone, 2003; Currie & Neidell, 2005)。例如,研究(Chay & Greenstone, 2003)揭示了郡县中污染水平的降低与婴儿死亡率降低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一研究取向还没有被用于青少年研究中,但是为日后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有前景的领域。

## 选择

选择或省减变量的偏向不仅是采用非实验设计研究“社区效应”所面临的主要批评,还反映了大多数已有社区研究在效度上面临的一个潜在威胁。选择是指家庭有机会选择其居住的社区,省减(或不测量)的某些与社区有关的变量或许能够用来解释一些社区效应(Duncan, Connell, & Klevanov, 1997; Manski, 1993; Tienda, 1991)。将选择偏向问题最小化的一个常用策略是说清楚分析模型中的儿童(如

性别和年龄)和家庭(如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的人口学特征。因为社区特征是由家庭构成来确定的,因此认为这个方法比较合适,但是仍然不能完全克服选择偏向的问题。此外,许多假定的省减变量(如父母的抑郁或动机)并没有被考虑到大多数研究中,这些变量的省减所产生的偏差方向也不清楚。例如,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的青少年父母可能比心理健康状况较好的父母更可能住在条件不利的社区中。相反,同为住在条件不利社区的家庭,做事更有条理性的青少年父母比条理性差的父母更愿意为孩子的娱乐活动提供资金。尽管潜在的选择问题是由未观察到的变量引起的,但是一项考察美国芝加哥社区人类发展项目家庭中影响社区选择因素的研究发现,省减变量虽然被假定为社区研究中(如那些已经提到的)选择性偏差的潜在威胁,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其对社区的选择几乎没有影响(Sampson & Sharkey, 2008)。确切地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水平是与社区筛选关系最密切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种族/民族、收入和教育等)在社区研究中通常会得到控制。因此,控制了这些前面所提到的主要家庭特征,就足以实现对社区效应的合理化评估。

研究者也采用不同的分析策略来探讨选择问题。这些方法包括兄弟姐妹的对比或堂兄弟姐妹的对比,因为他们所处的家庭特征是恒定的(Aaronson, 1997);工具性的变量分析,将未测量的社区特征和青少年发展结果间的相关关系最小化(Foster & McLanahan, 1996);行为基因模型,区分基因和环境的影响(Caspi, Taylor, Moffitt, & Plomin, 2000; Cleveland, 2003);倾向性分数方法,对居住或不居住在特定类型社区的青少年进行匹配(Harding, 2003)。然而,只有实验设计能完全克服社区研究中的选择问题(尽管可能会出现其他选择性问题)。

## 社区结构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这里的综述是基于 20 世纪 90 年代所做的研究并有文献发表的相关社区(Leventhal & Brooks-Gunn, 2000, 2003a, 2004a)。这个领域的研究在 21 世纪持续地激增(Entwisle, 2007; Sampson et al., 2002)。为了整合这些新近的发展,依然对相关数据资料库的综述按照先前用过的类似步骤来进行(Leventhal & Brooks-Gunn, 2000, 2003a, 2004a)。在综述中,集中梳理三个最常被考察的结构维度(通过普查进行的评估):收入/社会经济地位(富裕/高社会经济地位、贫困/低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民族多样性、住所的不稳定性。在综述种族/民族多样性和住所不稳定性时获得了一些不一致的发现,为此,只在这里总结了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发现。其他两个社区结构维度会在后面的部分进行探讨。在综述的两个部分中,只梳理分析了那些对引发潜在选择问题的个体、家庭特征(如儿童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家庭收入和构成;母亲受教育程度、年龄)及类似变量进行考察的研究。

幸福健康的三个主要领域依次是:(1)教育和职业成就(测验分数、留级、中学的中途退学情况、是否上大学、完成学业的时间长短、职业、赚钱多少),(2)情绪和社会性健康(心理健康、犯罪、不良行为、药物滥用),(3)性行为(性启蒙的年龄、性伙伴的数量、避孕措施的使用)及子女教养。无论何时只要可能,我们都会区别对待关于青少年早期(11~15岁)和青少年晚期(16~19岁)的发现,因为社区可能对每个发展阶段的发展结果具有不同的影响(Aber, Gephart, Brooks-Gunn, & Connell, 1997)。例如,社区对青少年晚期个体的影响有所增长,因为此时的青少年拥有相对更多的自主性,从而使其受到更多的家庭外影响,包括社区(Elliot et al., 1996)。

## 成就

综述研究发现,最强有力的证据是社区中居民的高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成就的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控制了儿童和家庭的背景特征)。所住的社区具有更多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对年幼青少年和年长青少年的成就发展均有益处。这种关系模式得到了使用不同分析技术的非实验研究的支持,但是实验研究支持这一发现的程度较小。

早期关于社区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成就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非实验性城市和附带普查数据的地区性样本开展的(Connell & Halpern-Felsher, 1997; Dornbusch, Ritter, & Steinberg, 1991; Entwisle et al., 1994; Halpern-Felsher et al., 1997)。一般来说,这些研究证明了社区高社会经济地位/收入与青少年成就的不同指标(数学成绩、基本技能测验、年级平均成绩、教育风险评分)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这一关系模式在两个以社区为基础的纵向儿童研究中得以证实,一项研究的取样范围是4~16岁的个体,另一研究的取样范围是9~17岁的个体。第一个研究采用多样化的芝加哥儿童作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社区中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的存在与过去六年儿童的平均言语能力存在正向关系(Leventhal, Xue, & Brooks-Gunn, 2006)。第二个是以安大略儿童为被试开展的一个代表性社区研究,结果发现个体在儿童晚期到青少年期所在社区的富裕程度与个体在成年早期的教育成就存在正向联系,对于非贫困家庭青少年尤其如此(Boyle, Georgiades, Racine, & Mustard, 2007)。一个主要基于欧裔美国青少年的多场所、多地区横断研究证明,社区中等收入与青少年的语言能力存在正向关系,但是该研究还发现来自较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的言语能力与社区收入的正向关系最强(Gordon et al., 2003)。

城市和地区性研究获得了关于年幼青少年成就发展的其他一些发